

陕西珍贵文物丛书



陕西陶俑精华

A TREASURY OF POTTERY FIGURES IN SHAANXI

陕西陶俑精华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
宋振兴 选编 魏勇娥 刘向群 撰文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陕西陶俑精华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

宋振兴 选编

魏勇娥 撰文

刘向群 撰文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2开本 12印张 50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8—0021—5

J·22 定价：30.00元

卷首语

陶俑艺术是我国雕塑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它伴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和俑殉的习俗而产生发展。建国以来，陕西出土的陶俑数以万计，这些陶俑取材广泛，造型生动，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科学水平和文化艺术息息相关，是古代艺术大师们慧思巧手留下的艺术珍品。

《陕西陶俑精华》一书，集陕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宋、元各时代陶俑艺术精华之大成，反映了历代陶俑艺术的时代风貌和各个时期的沿革发展。本书图版一百一十二幅，全系彩色精印。选编的陶俑都是建国后出土的珍品，按时代顺序排列。图版说明提供了每件陶俑的出土时间、尺寸、特征与简介。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稚拙古朴的陶塑人头像与人头壶；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大小如真的秦兵马俑；完全写实，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汉代骑马武士俑及牛、羊、马等动物俑与农田水利模型；富于时代精神的南北朝铠甲马；釉色光洁、色彩绚丽的唐三彩俑与充满神奇幻想的镇墓兽和天王俑以及表现游牧民族特征的元代骑马俑等等。其形象或生动、纯朴健美、婀娜多姿；或威严、神秘，气势慑人。这些珍贵的陶俑经千年埋葬之后重见天日，它那永恒的艺术价值与深刻的历史意义，则通过本书可使我们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也给研究中国历史与陶塑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责任编辑

邵梦龙

装帧设计

摄 影

张斌元

目 录

中国历代陶俑概说(代序) (1)

图 版

1. 人头像(新石器时代)	(10)
2. 人头壶(新石器时代)	(11)
3. 将军俑(秦)	(13)
4. 军吏俑(秦)	(14)
5. 军吏俑(秦)	(15)
6. 铠甲武士俑(秦)	(16)
7. 立射俑(秦)	(17)
8. 跪射武士俑(秦)	(18)
9. 鞍马及牵马俑(秦)	(19)
10. 陶 马(秦)	(20)
11. 跪坐俑(秦)	(21)
12. 加彩指挥俑(西汉)	(23)
13. 彩绘持盾俑(西汉)	(24)
14. 彩绘乐俑(西汉)	(25)
15. 彩绘铠甲俑(西汉)	(26)
16. 彩绘骑马俑(西汉)	(27)
17. 彩绘跪坐俑(西汉)	(28)
18. 彩绘跪坐俑(西汉)	(29)
19. 彩绘男立俑(西汉)	(30)
20. 彩绘扁身女立俑(西汉)	(31)

21. 彩绘扁身男立俑 (西汉)	(32)
22. 大喇叭裙女立俑 (西汉)	(33)
23. 持锸俑 (东汉)	(34)
24. 红陶立俑 (东汉)	(35)
25. 红陶坐俑 (东汉)	(36)
26. 盘角绵羊 (东汉)	(37)
27. 独角兽 (东汉)	(38)
28. 灰陶击鼓骑马俑 (北魏)	(40)
29. 灰陶号角骑马俑 (北魏)	(41)
30. 铠甲骑马俑 (北魏)	(42)
31. 带弓箭男立俑 (北魏)	(43)
32. 彩绘十字高髻女立俑 (北魏)	(44)
33. 彩绘十字叠髻女立俑 (北魏)	(45)
34. 彩绘文吏俑 (西魏)	(46)
35. 彩绘捧印俑 (西魏)	(47)
36. 彩绘武士俑 (西魏)	(48)
37. 彩绘双髻女侍俑 (西魏)	(49)
38. 彩绘镇墓兽 (西魏)	(50)
39. 彩绘文官俑 (隋)	(51)
40. 彩绘簸箕女坐俑 (隋)	(52)
41. 彩绘人面镇墓兽 (隋)	(53)
42. 彩绘卧虎 (隋)	(55)
43. 彩绘女立俑 (隋)	(56)
44. 白陶抬蹄马 (唐)	(57)
45. 彩绘釉陶男立俑 (唐)	(58)
46. 彩绘釉陶文吏俑 (唐)	(59)
47. 彩绘釉陶武官俑 (唐)	(60)
48. 彩绘釉陶骑马俑 (唐)	(61)

49. 彩绘釉陶女骑俑 (唐)	(62)
50. 彩绘釉陶乐舞俑群 (唐)	(63)
51. 彩绘釉陶载物骆驼 (唐)	(64)
52. 三彩文臣俑 (唐)	(65)
53. 三彩天王俑 (唐)	(66)
54. 三彩镇墓兽 (唐)	(67)
55. 三彩牵马俑 (唐)	(68)
56. 三彩三花马 (唐)	(69)
57. 三彩骑马狩猎俑 (唐)	(70)
58. 贴金铠甲骑马俑 (唐)	(71)
59. 三彩马及牵马俑 (唐)	(72)
60. 三彩单峰骆驼及牵驼俑 (唐)	(73)
61. 三彩彩绘女骑马俑 (唐)	(74)
62. 彩绘击球骑马俑 (唐)	(75)
63. 彩绘猎兽骑马俑 (唐)	(76)
64. 彩绘袒身骑马俑 (唐)	(77)
65. 彩绘骑马带物俑 (唐)	(78)
66. 三彩骑马带犬俑 (唐)	(79)
67. 三彩女立俑 (唐)	(80)
68. 三彩女立俑 (唐)	(81)
69. 三彩女立俑 (唐)	(82)
70. 三彩女立俑 (唐)	(83)
71. 三彩骆驼载乐舞俑 (唐)	(84)
72. 三彩载物骆驼 (唐)	(85)
73. 三彩天王俑 (唐)	(86)
74. 三彩镇墓兽 (唐)	(87)
75. 三彩马及牵马俑 (唐)	(88)
76. 三彩高髻女坐俑 (唐)	(89)

77. 三彩狮子(唐)	(90)
78. 三彩吹笙女坐俑(唐)	(91)
79. 彩绘骑骆驼俑(唐)	(92)
80. 彩绘胡装立俑(唐)	(93)
81. 彩绘高髻女立俑(唐)	(94)
82. 三彩马(唐)	(95)
83. 彩绘偏髻女立俑(唐)	(96)
84. 彩绘高髻女立俑(唐)	(97)
85. 红陶说唱俑(唐)	(98)
86. 彩绘捧物女立俑(唐)	(99)
87. 彩绘持镜女立俑(唐)	(100)
88. 黑人小立俑(唐)	(101)
89. 彩绘陶立俑(宋)	(103)
90. 彩绘仆从俑(宋)	(104)
91. 绿釉陶坐俑(宋)	(105)
92. 彩绘陶女立俑(元)	(106)
93. 彩绘陶鞍马(元)	(107)
94. 灰陶马及牵马俑(元)	(108)
95. 灰陶男骑马俑(元)	(109)
96. 灰陶捧盒女侍俑(元)	(110)
97. 灰陶拱手女侍俑(元)	(121)
98. 灰陶卫士俑(元)	(112)
99. 灰陶骑骆驼击鼓俑(元)	(113)
100. 灰陶骆驼(元)	(114)
图版解说	(115)
后记	(134)

中国历代陶俑概说

王仁波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特的技巧、优异的民族传统风格，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放射出绚烂的光彩。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在中国古代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雕塑艺术起源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远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陶器的发明和使用不仅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远古先民通过对盆、罐、壶、鼎、鬲的制造，熟练地掌握了泥的性能和使用技术，从而提高了塑造能力。陶器表面的装饰，除彩绘之外，还出现了印纹、划纹、刻纹、堆纹等装饰，有的陶器上，还出现了捏塑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贴附或配置在器面用作装饰。其常见的题材有鸟、兽、人面、人头等。1953年在陕西洛南发现的人头壶和1973年黄陵出土的人头像即是。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商周以后出现的陶俑、彩绘陶俑、彩塑造像，应是萌芽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黑陶器物。

商周奴隶制时代，以活人、活马、活狗、活鸡等等殉葬之风盛极一时。在安阳殷墟大型奴隶主墓葬的发掘工作中，曾发现每座墓殉葬奴隶数十人，甚至多达三、四百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的殷墟人殉，人牲总数约为五千件以上，证实了文献所记载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的真实性。但同时也发现了以陶质、石质和玉质的男女俑和动物俑来殉葬的，如安阳小屯殷墟文化早期的窖穴中曾发现三个戴着手枷的奴隶陶俑；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商代前期的灰坑和探方中曾发现陶跪坐人像、陶虎、羊头、龟、鱼等；在安阳小屯商代后期的灰坑中曾发现陶牛头和鸮等；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陶俑。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说商周时代是中国陶俑的产生时期。陶俑的出现并不是出于奴隶主的仁慈之心，而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奴隶，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

历史前进的车轮驶进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揭开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序幕，用俑葬代替人殉是社会变革在丧葬礼仪制度上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一时期是陶俑大发展的孕育期。战国时期的人殉墓葬，解放前曾在河南汲县山彪镇发现过。解放后，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进展，截止1979年的初步统计，三十年里先后发现了三千多座战国墓葬，其中人殉墓葬约三十座，见于发表且资料较完整的有十七座。这时，原来被传统地视为“礼”的人殉，已被人们作为“非礼”，加以抵制和反对。山东临淄郎家庄春秋战国之际的1号墓，在用人殉的同时，也使用了成组的陶俑随葬，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俑葬墓之一。战国时期的墓葬，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北平山、河南信阳长台关、洛阳西工段、湖

北江陵、湖南长沙等地的许多大型和中等墓葬已经是只用俑葬而不用人殉了。1954—1955年清理的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总数达1005件，但不使用人殉，而用俑葬。其中有铜人3件、陶俑18件。陶俑有刀刻痕，涂丹珠，其形多样，或抱或负，或舞或拱，头有髻，足下平齐有一孔。

从春秋时期的俑葬是“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到秦献公元年（前384年）秦国“止从死”（《史记·秦本纪》卷5），废除了用奴隶殉葬的制度。用俑葬代替人殉、马殉是解放生产力，解放奴隶，提高奴隶社会地位的一项革新措施。一百多年后出现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阵容严整、栩栩如生的秦兵马俑群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社会变革引起葬葬礼仪的变化，正是陶俑雕塑艺术发展的社会条件。

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雕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是陶俑雕塑艺术的发展期。近几年来，在陕西临潼骊山下的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调查发掘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出土了几千件陶塑兵马俑组成的秦代军阵；在外城东面的上焦村发现的马厩坑中，出有象征管理马厩的圉人或圉师的跽坐俑，还在陪葬坑中发现有象征饲养战马和珍禽异兽的饲养者。

一号兵马俑坑内军阵的排列井然有序，面朝东为三列横队，每列70件，共210件，为军阵的前锋；三列横队的后边面朝东方的11组（一个过洞内为一组），共38路纵队，是为军阵的主体；左右两边各一列为西南、西北的侧翼横队，为军阵的左右两侧的侧翼卫队。由战车、步兵组成的一号兵马俑坑的军阵，可能象征秦都咸阳禁卫军的右军，按目前已揭露的坑内马俑的分布密度推算，一号坑共有兵马俑六千余件。

二号兵马俑坑平面呈曲尺形，由四单元所组成，第一单元，即曲尺的东端，由持弓弩跪射的徒兵组成的方阵；第二单元，即曲尺的南半部，是由战车组成的方阵；第三单元，即曲尺形的中部，是车徒结合的长方形军阵；第四单元，即曲尺形的北半部，是由骑兵组成的长方阵。由战车和骑兵为主的第二号兵马俑坑的军阵，象征秦都咸阳禁卫军的左军（另一未建成的废弃坑，可能象征中军）。

三号兵马俑坑的平面布局分为车马房和南北厢房。在车马房内发现木质战车1辆，车前驾陶马4匹，车后有武士俑4件，南厢房内出土铠甲武士俑42件，北厢房内出土铠甲武士俑22件。第三号兵马俑坑可能是象征统帅右、左、中三军的指挥机关。

秦人具有养马的优良传统。“驷铁孔阜，六辔在手”。“骐驥是中，駒驥是骖”。秦民歌中曾以这样优美的诗句，来描写秦马生气勃勃的矫姿，称颂秦养马业的兴旺景象。尔后，养马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并成为秦国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这批陶马，体形特征近于今日河曲马，甚至身高、体长、胸围、管围的大小尺寸也与今日河曲马相近，属乘、挽兼用型的马种之一。

兵马俑是纪念碑性的大型群塑。它以秦国军阵为创作题材，再现了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壮丽图景，展开了二千多年前秦始皇驰骋疆场、统一六国、削平群雄的历史画卷。

早在战国时期雕塑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并且摆脱了商周时期那种神秘、呆滞、忧郁的气氛，开创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写实、活泼、开朗的风格。秦兵马俑的成功塑造，是中国雕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就艺术内容说，这座里程碑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和秦王朝国威的颂歌，这座里程碑也暴露了秦始皇残酷压迫人民的本质，为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埋下了危机四起的祸根，镌刻了埋葬秦王朝时悲哀的挽歌。

秦代雕塑大师和工匠们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秦国军队的兵马为模特儿进行雕塑，用雕刀和塑版紧紧地捕捉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种人物的性格、体态、年龄的特征，维妙维肖地刻画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军阵中的人物有的威严庄重、有的沉着刚毅、有的勇敢机灵、有的老成持重、有的年轻纯朴。脸部表情有喜、怒、哀、乐；脸部造型有美、丑、胖、瘦。各种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刻划入微。绝大多数陶人、陶马躯体的比例匀称，质感极强，说明塑造时观察细腻，掌握了一定的解剖知识。在秦俑的塑造过程中，表现人物形象时，注意到形和神的关系，处理军阵场面时，注意到动和静的关系；表现军阵的布局时，注意到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体现艺术风格时，注意到写实和夸张的关系。

秦兵马俑、堆、捏、贴、刻、画等技法兼用，而以塑、刻、画为主，为汉唐雕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代又是我国雕塑艺术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西汉初期内叛乱，外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加强了汉帝国的军事力量，为雕塑艺术提供了新的题材。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为雕塑艺术注入了新的因素。

汉承秦制，用大量陶俑随葬或祭祀，本是秦人之俗，西汉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丧葬礼仪。《潜夫论·浮侈篇》描绘了汉代厚葬之风，“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伴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各种武士俑、骑俑、车马、男女侍俑、舞俑、乐俑、说唱俑均埋入墓中或墓旁的陪葬坑内，“故作偶人以待尸柩（《论衡·薄葬篇》）。”各种家畜家禽，如：马、牛、羊、鸡、犬、豕、鸭、鹅，被塑成陶俑埋入墓中。还有各种陶塑的建筑物，如：多层楼房、平房、亭台、水榭、仓库、厨房以及井栏、猪圈、厕所、水磨、木船、池塘、水田等等。高坟大冢极力模仿地上邸宅，坟内“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盐铁论·散不足篇》）。”

在陕西省咸阳市东北郊的杨家湾汉墓内发现了 11 个陪葬坑，其中骑兵俑坑 6 个，步

兵俑坑4个，战车坑1个，出土步兵俑1965件、骑兵俑583件。骑兵俑制作精细，造型生动，战马形体逼真，骑士刚毅威武，构成了阵容壮观、部伍严整的骑兵俑群。墓葬年代为西汉文景帝(前179—前141年)时期，据《水经注》记载，这一带有成国渠流经丞相周勃父子塚，因此推测杨家湾四、五号汉墓为周勃或其子周亚夫的墓葬。随葬的陶俑群与墓主人的地位也是相称的。这批军阵俑群在军事历史题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反映了文景帝时期骑兵的发展情况。西汉统治者从实践经验中认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据《汉书》记载，文帝三年(前177年)丞相灌婴率骑兵八万五千人出击匈奴，文帝十四年(前166年)，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发车千乘、骑十万，在长安附近防备匈奴入侵，一次军事行动中，动用十万骑兵，这是史无前例的。杨家湾这批骑兵俑生动地塑造了西汉文景帝时期的骑兵形象。十一个陪葬坑的排列，以步兵俑为前锋，以骑兵俑为后备队，也反映了西汉时期军阵的组成情况。其次，汉代养马业的发展，对于巩固国防、抵御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书·景帝纪》(卷5)记载，景帝时期(前156—前141年)曾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达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马达四十万匹之多。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骑马俑，马的体形具有头轻、眼大、耳壳薄、鼻孔大、口裂深，颈长适中、臀甲发达、胸部宽广、背腰短阔，尻部宽稍斜，四肢坚强，蹄质坚固，与茂陵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雕的石马、甘肃武威擂台的铜奔马同具鸟孙马种的良格。

位于咸阳市东北的汉惠帝(前194—前188年)安陵东，分布着一批陪葬墓，现保存有封土堆十六座，在十一号陪葬墓的封土下，围绕着墓室上口四周，有一方形砖槽从墓沟，在南沟中段清理时曾发现武士俑84件、陶牛46件、陶羊125件、陶猪23件。西安东郊白鹿原汉陵从葬坑，瘗埋着彩绘陶俑、陶罐和马、羊、猪、狗、鸡、鹅、鹤等禽兽骨骼及谷物。这些从葬坑中出土的动物俑反映了西汉时期畜牧业的空前发展，男女僮仆俑塑造了汉代家私奴婢的形象。

西汉中期至东汉，在全国各地汉墓中出土的陶俑和各种陶明器，题材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河南省济源县泗涧沟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釉陶桃都树，在树上塑造了天鸡、鸟、猴、蝉、奔马、裸体人等，郭沫若先生考证此为“桃都树”。这种题材是从扶桑树演变而来，符合天鸡的传说。为汉代陶塑的新题材。出土的红陶风车、有摇风车俑和踏碓俑，附在风车和米碓的模型中，生动地塑造了奴婢们“鸡鸣春”的生活情景。河南淅川县东汉晚期墓中出土一件陶水榭，由水池和亭榭组成，水榭下层有盘膝而坐的主人，还有拥彗的侍者及骑马的猎夫。池中龟、鳖、鸭、鹅、鱼浮游于内，池岸上周围列置羊、鹅、鸡、麋鹿等。这是一座典型的苑囿池榭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东汉时期豪强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面貌。

汉代陶俑的雕塑水平是相当高的。西汉初期人物形象单纯、生动而准确，对于人体的细微变化并不作细致的处理，而是在掌握了人物的动态和基本比例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变形，并赋予感情的变化。例如男女侍从扁身俑，尽管身体的上部是扁平而硬直的，下部裙子作简朴的喇叭状，但是感情的变化洋溢于眉宇间。四川省新都县东汉墓内出土的说唱俑，从人体四肢的比例和解剖角度去观察，都不太准确，但是雕塑大师却抓住了说唱人的特点，把击鼓人的姿态、眉飞色舞的神气，用简练概括的雕塑技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拥有武装部曲。十六国时期的西安南郊草厂坡一号墓，在小墓内出土以牛车为主体的仪仗俑约 80 件，其中包括武士俑、着甲武士俑、铠甲骑马俑、击鼓、号角骑马俑、甲马等，前墓室出土男女侍俑和女坐乐俑约 20 件，都生动地塑造出墓主人生前拥有为数众多的出则作战、入则被役使的部曲，是一个汉族豪强地主墓。大同市东南石家寨村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北魏延兴四年—太和八年，474—484 年），前墓室内出土男女俑、着甲骑马俑、武士俑和木俑共 320 件，此外还有大型陶马、驮粮马等 30 多件，耳室出土女乐俑 3 件。大多数陶俑的面貌不像汉族，也不像中原地区常见的胡俑，推测是拓跋族人民的形象。司马金龙是投降北魏的晋皇室的后代，文献记载他们父子开府云中，历数十年，死后都被赠以王爵。

近年来在日本群马县古坟周围发现了梳横髻长裙的埴轮妇人，与南京幕府山南朝墓中所出土的女俑的服饰似；在日本埼玉县古坟周围曾发现了戴盔帽着褶襷的埴轮男子，其服饰与邓县画像砖墓出土的男俑相似。据《日本书纪》、《古事记传》的记载，南朝的制陶、缝衣等工匠来到日本，陶俑（埴轮）的发现证实了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汉中市崔家营西魏墓出土各类陶俑 70 多件，其中仪仗俑约 66 件。头上饰花，“魋髻”平指，为蜀人的习俗。武士俑、捧印俑服饰为南北朝时期“褒衣博带”的风格，身躯苗条修长，有魏晋时期“秀骨清像”的特点。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陶俑雕塑艺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时期。唐长安城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国际性大城市，它与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犹如天空中两颗闪闪发光的明星，照耀着东方和西方。这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来宾，许多外国和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友好使者、宾客、商人、艺术家、音乐家在这里活跃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是雕塑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雕塑大师们深入生活、细腻观察，把各种人物形象、动物体态、生活场面，都捕捉到他们的雕刀、塑版范围之内。雕塑大师和工匠们在雕塑陶、三彩俑时既注意外形，又注意刻画了它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做到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

陶俑和三彩陶俑的塑造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构思和制作。构思阶段包括典型的概括和粉本的塑造。制作阶段包括造型、制模、压制、修整、素烧，陶彩绘、三彩则需施釉、釉烧等特殊工艺。雕塑家和工匠们运用塑、贴、挖、划、画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各种人物的形象、脸部表情、衣纹服饰和精神状态，塑成了千年不朽的艺术杰作。

西安地区隋唐墓葬中的陶、三彩明器，大致可分为六大类：(1)镇墓俑(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十二生肖俑)。(2)仪仗俑(以牛车、乘马、乘驼为主体的仪仗俑，立俑、武士骑马俑、奏乐仪仗俑、狩猎骑马俑及牵马、牵驼俑)。(3)僮仆俑。(4)动物俑。(5)生活用具。(6)建筑模型。

根据田野考古工作的资料，隋唐时期墓葬内陶俑的变化大致可分四个阶段：(1)隋—唐高宗时期(589—683年)，突出表现墓主人的外出仪仗，以牛车为主体的仪仗队在墓中流行。(2)武则天—中宗时期(684—710年)，仪仗俑群继续流行，牛车的位置逐渐被乘马所代替，形成以立马为主体的仪仗俑群。(3)睿宗—代宗时期(711—779年)，由注意外出仪仗转而注意家居生活。僮仆俑和园宅假山明器的盛行，使音声仪仗气氛减弱。(4)德宗—唐末(780—907年)，厚葬成风。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以后一般墓中陶俑数量减少，而金属俑数量增多，木俑开始流行。

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三彩器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鸣驼骏马和牵马、牵驼俑。缕缕蚕丝织友情，鸣驼千里传佳音。唐三彩中那些满载丝绸的骆驼，正是奔驰在丝绸之路上骆驼队的形象，西安西郊中堡村出土的三彩骆驼和牵驼俑，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运输丝绸的场面。唐长安城中居住着很多深目高鼻、赤髯紫眼、琉璃宝眼的中亚胡人，那些头戴翻沿虚帽、身着窄袖长衫、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陶、三彩牵马、牵驼俑，如唐诗中所描绘“织成蕃帽虚顶尖，细颤胡衫双袖小”的形象。

唐代诗人岑参在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反映了唐代骏马奔驰在丝绸之路上和星罗棋布的驿站间的情景。唐代养马业发达，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马匹在唐高宗时期有七十万六千匹，开元年间为四十三万匹。在唐代皇室的马厩里，在长安城附近官僚贵族的庄园里，饲养了为数甚多的马匹。外来的马种源源不断运来长安，为唐代雕塑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唐三彩马以比例准确、肌肉清晰、神态生动而著称于中国古代雕塑史。咸阳北郊契苾明墓出土的三彩陶马成功地塑造了新疆伊犁马的良格。张士贵墓出土的白陶抬蹄马俑，可与唐诗形容舞马“君看此马不受羁，天骄势欲凌云飞”的诗句相印证。

唐三彩女俑维妙维肖，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初唐时期的陶、三彩女俑身材苗条、衣服紧窄，体态俊秀；盛唐时期的西安中堡村、高楼村唐墓女俑具有大髻宽衣、丰厚为体的特点。

“遨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是盛唐时期妇女骑马、女扮男装的一种时髦。永泰墓、李贞墓出土的女骑马俑着意塑造了这种时代风尚。

唐代封建统治者把狩猎活动视作人生三大乐事之一，他们在酒足饭饱之余，便逐兽山林射飞苑中，沉浸在以射猎为乐的奢侈生活里，懿德墓三彩陶骑猎俑成功地塑造了唐代皇室的狩猎场面。有的佩挂箭囊、弓囊和剑，架鹰出猎，有的作侧身仰望、注视天空中飞翔的猎物，两手作张弓搭箭的射放姿势，正是“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的写照。有的鞍后还带着猎获物——兽和飞禽，可与“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的诗句相印证。

懿德墓中出土 113 件贴金彩绘陶骑俑，证实了文献记载皇室在阅兵、献俘、讲武、礼乐典礼或仪式中使用金银铠甲的情况，正如唐诗中所描绘的“金甲耀兜鍪，黄金拂紫骝。”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隋唐墓中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反映了雕塑家和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将现实生活中肃穆的文官、勇猛的武士、阴间辟邪的镇墓兽，描绘得恰到好处。

宋辽金元明是中国古代陶俑的衰落期，大型墓葬中的陶俑已经结束了它们的黄金时代，而逐渐被纸人、纸马所代替。纸做的明器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盛唐——中唐墓中曾有发现，中晚唐时期文献记载有纸被、纸帐，宋元时期更为盛行，据《元典章·礼部·葬礼》(典章三十)：“除纸钱外，据纸糊房子，金银人马、采帛衣服、帐幕等物，钦依圣旨，事意裁目，尽行禁断。”《元典章·礼部·丧礼》(典章三十)：“纸做来的金银纸房、纸人、纸马、袄子休做者”。纸明器的盛行，必然导致陶俑的衰落，但是这一时期的墓中仍有一些陶俑出土。如河南焦作新李封宋墓中出土的陶男侍、女侍俑，体态修长，娴雅纤秀。河南焦作西冯封村出土的金代陶杂剧俑，有吹哨俑、持节板俑、吹笛俑、说唱俑、叉手俑等等，人物的发式，大部在脑后梳长辫，前额和头顶剃光，是金人的习俗。人物的姿态，简练明确，表情丰富，剧舞演技维妙维肖，是砖雕俑的杰作。元代陶俑大都为深灰胎，不上釉，有的面貌类似色目人。西安曲江池元墓出土的彩绘女立俑、陶马，陕西户县元贺氏墓出土的灰陶马、牵马俑、骑马俑、骆驼等等，这些陶俑在表现技巧、制作手法上，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比起秦汉唐时期的陶俑不免逊色，已成“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之势。随着陶俑的衰落，中国古代雕塑史又在其他领域揭开了另一新的篇章。

图 版